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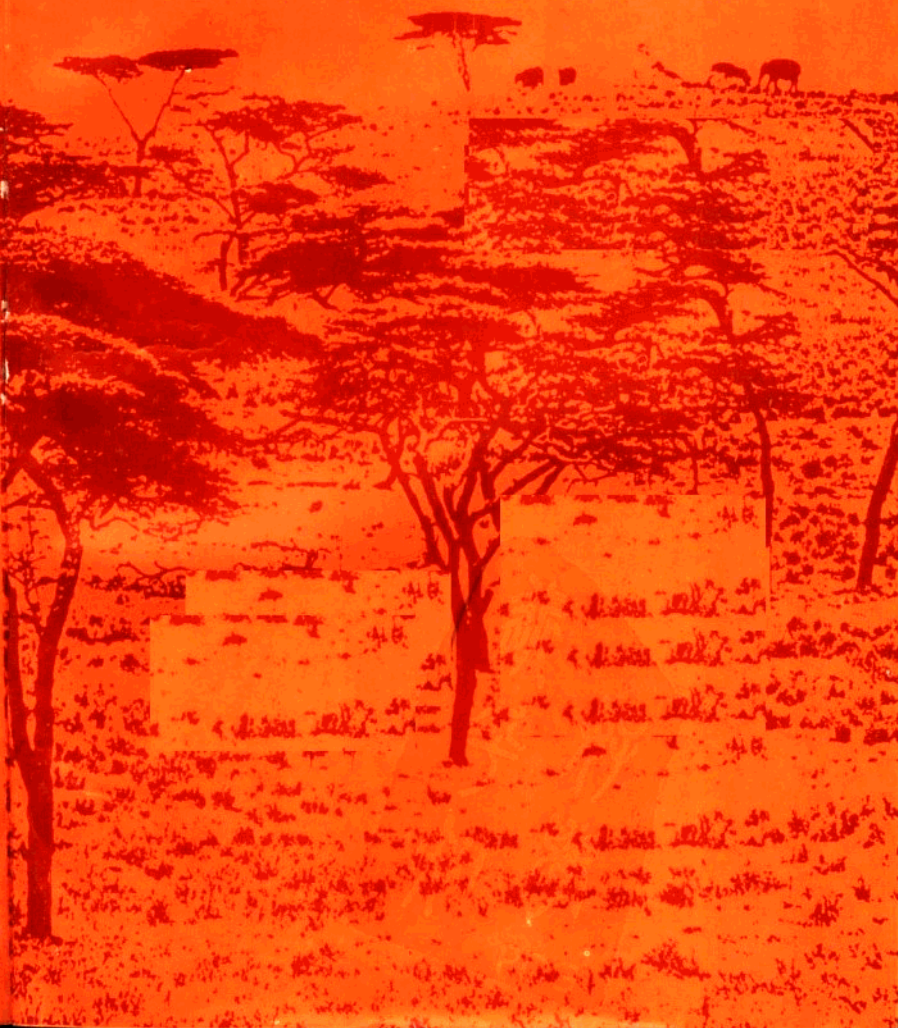
FENG  
REN YUAN  
DE  
NAN NAN  
NÜ NÜ 海燕出版社

FENG REN YUAN DE NAN NAN NÜ NÜ

# 疯人院的男男女女

顾工 著

# 疯人院的男女



插图，李运江

疯人院的男男女女

顾工 著

海燕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30千字

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760册

ISBN 7-5350-0656-6/I·155

---

定 价 2.10元

## 1. 铁门,在背后关上

沉重的铁门,像是地狱之门,在我背后,“咣当”一声关上;巨大的铁锁,“咔嚓”一下合拢。

一群疯子向我扑来,各种各样的形状,各种各样的面孔,各种各样的声音:

“啊哈!你是钓鱼台派来的!”

“明天你就会当将军、当将军!”

“你是大工贼、大内奸、大叛徒!”

“把他抓起来、揪出来!”

“踏上一只脚、踏上一百只脚、踏上一万只脚!”

“……”

疯人的脸,有的嘻笑、有的狰狞、有的扭曲……

我恐惧极了,比我预想的还要恐惧。多年前,我去过动物园,在一个盘绕着几条毒蛇的蛇笼里,放着一只小白鸽子和一只小白老鼠。它们俩本来是不同类的,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下,但现在竟同时依偎在同一个角落,一起瑟瑟发抖……

它们俩注视着从蛇嘴里吐出的带血的鼠皮;

它俩注视着被撕碎的杂乱的羽毛……

金环蛇的每个环节，都被塞满，凸了起来，暂时什么都不想吞咽。圆圆的小眼睛半睁半闭，露出贪婪的心安理得的神态……

我，我现在是那只小白老鼠吗？

是那只小白鸽吗？

我也在瑟瑟发抖吗？

我的一生的命运，将在这里作最后的裁决？！

不是由法官，不是由至高无上的领导，不是由党组织，也不是由军宣队、工宣队和许许多多学毛著的积极分子……不是，不是，都不是；而是由这样一群疯人——在活着的人类中，我最最害怕的就是疯子！

谁来拯救我？

谁能拯救我？

和我相爱过的贝芬吗？啊！她在哪里？她现在是死是活？啊！我竟然爱过人，竟然被人爱过？可是，现在我的身心在发抖、发抖……

有过，许多崇拜我的诗歌的读者，曾在公园里把我包围。记得那是一次作家和诗人的售书活动。那时，我刚刚出版了第三部诗集《鲜花·乐器和酒杯》。有人为这集子中的几首诗谱过曲，很快流传开来。我受到年轻人的爱戴。在团中央礼堂我登台朗诵，竟然一次又一次返场。唱歌，返场是常有的；可是朗诵诗……读者和听众，围上来叫我签名。我签得满头大汗，眼镜都时时要从汗湿的鼻梁上滑

落……

现在，包围着我的是一群疯子。

我已不是一个诗人，我也是一个疯子。

有谁说过：诗人和疯子只有一步之差；现在，我一步都不差了！

我不承认，不承认，我决不能承认。

我是清醒的、清晰的、清楚的。假使全世界的人都疯了，我仍然是充满感情和理智的。有人捶打我，我痛；有人撕抓我，我流血……

我，我的一切都是正常的。

我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！

## 2. 我很悲哀，他也悲哀

我是被农场的一名保卫干事和一名卫生员押送来的。

我有幸坐上了小吉普车。这种小车，我在报社当记者的时候，是经常坐的。那时我经常和省委书记、市委书记平起平坐。记者是无冕之王。我敢在任何大人物面前提任何问题——当然，我也懂得不能太出格，太没边儿。

我胸中有我的提纲，我的城府。

我不傻。在我到报社以前，据说已有十六名记者当上了右派；我决不能是第十七名。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但，我决不小心翼翼，唯唯诺诺。我好像还是很随便，很

洒脱。我谈话，提问题，写报道，都有我独到的机智——我这点，很招引许多女孩子的喜欢。

不过，我落得的最后下场，可能比那些戴上右派帽子的记者还要惨。他们有谁被关进了疯人院？全国的作家、诗人——现在差不多都下落不明——他们又有谁被关进了疯人院？！

不过，进这疯人院，确是有三分强迫，七分自愿。

我对这疯人院，既恐惧，又向往。

小吉普车在农场的乡间小道上颠动。颠动中，我的思绪，我的灵魂也在摇晃：疯人院会不会收留我？是被收留好？还是不被收留好？

疯人院会不会比猪圈强些？

疯人院里住的起码还是人，不像那猪圈，成天见到的只是猪猪猪：大猪、小猪，公猪、母猪，肥猪、瘦猪，还有我独自给它们取了许多浑号的猪——老祖宗、小病号、天吃星、猪九戒……

猪圈把我与世隔绝。

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很少看到人，没什么人和我谈话，我也无处去找人说。我默默写诗，随写随烧，把诗稿投进烧猪食的土灶里。

只有农场的场长有时来巡视。

他是位荣誉军人。他脱掉他的背心给我看，光是脊梁背上就有十六处伤：有子弹钻的，弹片划的，有刺刀插的，马刀砍的。这位老军人闹不清我是从哪儿来的？多嘴

来的？——他对猪的兴趣，看来要超过对我的兴趣。

“这头母猪，下多少头崽？”

“十三头。”

“怎么现在只剩下九头？”

“嗯，让母猪压死了两头，吃掉了一头——我也不知道母猪怎么会把亲生的小猪吃掉？也许是饿的，营养不足；也许是闻着气味不对——还有一头，是被夜猫子叼走的。”

浑身是伤的老军人、老场长，把背心甩到肩上。没有责怪，也没有嘉奖。他蹲在猪圈里的污秽中，逗弄着那些惊散又聚拢的小猪，像在逗弄着小狗和小猫。

“怎么都没闹？”

“我不会。”

老场长哈哈地仰天大笑：

“戴眼镜的，都是些秀才，就会拿笔，不会拿刀。有杀猪刀吗？”

“有，炊事班来杀过猪，把刀忘在灶台上了。”

“拿来。”

我遵命。这时候只要有个人和我说话，我就感到有了活力。我把杀猪刀，在灶台上顺手光了光。

老军人指挥我：

“抓住这头小猪的前腿，再拽紧后腿。抓住，抓紧。”

我这“秀才”，确是手无缚鸡之力，我从来不敢杀



鸡。现在要我死死抓紧乱踢乱蹬的小猪，真真够呛。我怕小猪咬我的手。猪急了，也会把人咬伤的。

老军人挥起尖尖的屠刀。

刀尖直刺进小猪的侧腹，轻轻一剂，就从里面取出了两个小蛋蛋。是不是睾丸？这雄性的小猪，今后就变成了雌性。不，变成了一个小小太监。

人真聪明，能从人想到猪；从猪想到人。

我不得不敬佩这位老场长。他当年在战场上拼刺刀时，一定也是一刺一个准。不过，人大概不会像猪这样容易穿刺。嗯，从战场——到农场。

老军人扔下带血的屠刀走了。

临走时，他嘱咐了一句：“给阉猪的伤口上抹点药，免得它受感染、化脓。”

我答应了。我很悲哀。

望着他那布满伤痕的背影，我感到他也很悲哀。

当然，把我送进疯人院，并不是从这件事开始。

### 3. 话，抖动在唇边

我在猪圈里接到一个通知——这是我被“下放”到这农场后，接到的第一个通知。去农场场部，参加十九级以上干部的“批陈”会。

十九级？我还是十九级？还有人想起我是，承认我是

十九级？这使我又惊又喜。

我到这农场后，也参加过几次会，那都是和揪出来的定了性的劳改犯在一起。他们一个个都蓬头垢面，褴褛不堪。我感到我和这样一些人“同流合污”，成为“一丘之貉”，实在是我的奇耻大辱。

这些人在被揪出来以前，大概也都很神气，很显赫过一时。从他们的缕缕白发看，蓬蓬黑须看，他们的原来级别，会比我高出许多，决不止是十九级。

可是他们现在应该比我低得多——他们是定了性的；而我是尚未定性的。我是个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界线上的人物；是属于那种推一推就过去了，拉一拉就过来了的人物。一句话，我只是个“黑线人物”。

我这种“黑”是不属于“黑五类”的，地富反坏右里没有它。

我这种“黑”是应该归入“黑九类”中的第九名。（所以我给我饲养的猪群中的一头黑猪，暗自取个浑号叫：“猪九戒”。这是时时对我自己的提醒。）

现在，我从“黑线”、黑猪中，竟然一下回升到人和人民中，并且是“十九级以上”的人民中，我怎能不受宠若惊，悲喜万状！

这是不是属于“拉一拉”？

这是不是让我回到“人民内部矛盾”的圈子中来？

呵，是谁在这样关心我？爱护我？

是不是那位老军人、老场长？别看他表面上对我没兴

趣，没客气话，暗中他一定还是在用老侦察兵的眼睛在注视着我。有时，他名义上是来看猪，实际上也许是来看我。

我从猪圈，走进农场场部的会议室。

会议室的人不多，只有八、九个，不到十个。在这离省城很远的荒滩上的农场能有几个“十九级以上”的呀！坐在这里的只有场长——在这方圆几十里之内，他大概是级别最高，最至高无上的了——政委，还有主任，还有几个副职，还有一个保卫科长。

他们都是管专政的；

我是属于被专政的；

现在我竟然能和他们坐在同一条靠背椅上，这说明了什么？是阶级消灭了吗？当然不是；是要放“黑线”出笼吗？当然也不是。那么，是什么呢？

我这“黑线”将要变成“红线”吗？

在猜疑中，在惊魂未定中，我抬眼看到正面的斑驳墙壁上，贴着条显赫的大横标：“坚决打倒叛徒、内奸、工贼、假马克思主义者陈伯达”。

啊！陈伯达，他不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吗？

谁要敢触犯中央文革的一根毫毛，谁就要被砸烂狗头；现在谁竟敢这样辱骂中央文革的顾问？竟然还这样堂而皇之，这样众目睽睽？

怎么谁都不扑上前去，把这“反标”（反动标语）撕掉，扯碎？！坐在这里的每个“专政工具”，怎么都这样目光炯炯，又这样视而不见？！

难道这红极一时的“红线人物”，也变成“黑线”了吗！

看来，“黑线”变“红线”很难（几乎还没有一个先例）；但“红线”变“黑线”倒很容易（这种例子天天有，时时有）。嗯，红与黑，黑与红……

我现在是“黑”是“红”呢？

是不是由于“陈”的变黑，我就可以变“红”呢？

“批陈”，对，我应该狠狠地“批陈”。

批什么？怎么批？！

老军人、老场长站在台上宣读着中央文件——我没听到开头，我不知道是中共中央的，还是中央文革的？不过，现在不分了；也许，中央文革的尤为重要。

老场长识字不多，读错了不少字（这是很危险的，不少人就是由于读错了字，呼错了口号，而被揪出来的），最后，总算读完。他举起带着枪伤、刀伤的手臂高呼口号。

口号总是差不多的，总是这个“伟大胜利”和那个“伟大胜利”，这个“万岁”和那个“万万岁”，不同的是口号越呼越多，越呼越长。现在新添加的这个口号就够绕嘴的：“揪出叛徒、内奸、工贼、假马克思主义者陈伯达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！”

这口号喊得断断续续，

这口号喊得上气不接下气，

这口号喊得凌乱不堪，有人喊完了，有人还在喊……

老场长宣布：“现在声讨冒充马克思、冒充小小

老百姓的陈伯达的声讨会正式开始。第一个请求发言的是在猪圈养猪的下放干部文斯。”

……文斯？！是在说我吗？

我什么时候“请求发言”？我能发什么言？

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，我就被剥夺了发言权。我这“黑线”和“黑帮”的混合物，是不准乱说乱动的。我是没有“四大自由”的；连贴大字报、刷大标语，都只能提个浆糊筒站在一边，不能动刷子的——大概是怕我这黑人伸出黑手，弄黑了这无产阶级的圣洁的墙壁。

现在“批陈”，我能批什么？

不过，这是明摆着的事，这是让我“反戈一击”，这是让我立功赎罪；我能坐失良机吗？

老场长走下讲台，站在我的身边，艰难地弯下腰：

“你不是见过陈伯达吗？”

“见，见过。”我的脸吓得惨白了：“那是隔老远，他站在台上，我站在台下。”

“他说了些什么？他放了些什么毒？你中了些什么毒？这总得肃一肃，清一清吧！”

“他当时到了我们报社，他当时说……”我有点发懵，他当时说什么，我真没听，没听清；反正和当时所有的人说的都差不多：“伟大胜利”啦！“越来越好”啦！他也挥动那红彤彤的语录本，我也随着挥动……

……揭发这些吗？这种揭发不又成了为他涂脂抹粉，成了包庇，成了带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的人！





老场长在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，

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盯视着我，

啊！这是满含热情的期待呢？还是严峻的考验？

我不得不站立起来，不得不走上台。

是上讲台呢？是上断头台？

一句话说错，就有掉脑袋的危险！

我紧张，我害怕。我没啥可说，又不能不说——当嫌疑犯最大的痛苦大概就是这样：没什么可招供的，可是又非招供出来点什么不可。

我不是陈伯达；我是在他蹂躏下的受害者。

我恨他，他发明了这么多中国词典上从来没有的词汇：“黑线”、“黑帮”、“牛鬼蛇神”……（这发明权是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？）我除了恨他，我还恨很多很多人——和他差不多的人。我不敢说，我若说出他们的名字，我就马上会被“砸烂狗头”，会变成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”。

不过，我说过，暗暗在心里说过。

那是在老母猪生下了十三头小猪崽的时候。有两头小猪崽在母猪腹下吮奶时，被翻身的母猪压死了。我怕猪崽的死，也成为我的罪证，就提着死猪崽去喂野狗——在这荒滩上，拖着红舌头的野狗特别多。

我扔出去一头又一头死猪崽，心中充满刻骨仇恨地说：

“吃掉它，这是江……”



“咬碎它，这是林……”

只有两头死猪崽，若有三头、四头、五头……我一定会充满刻骨仇恨地暗中说更多的名和姓——当然包括陈伯达，也许第三头或第四头就是陈伯达。

现在要我说，公开地说，我却又能说些什么？！

泪，涌上眼眶；

话，抖动在唇边；

我说，我说了出来——

#### 4. 她在血泊中怒喊

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”我在抛掷小猪崽的尸体时，心中充满的那种恨和恨的暗中发泄，决不是我的先知先觉，不是我的未卜先知；也许，这是出于我的阶级本性、阶级本能；不不，也许是出于人的本性，人的本能。

谁对我好，我就对他好。

谁对我坏，我就对他坏。

这就是鲁迅所说的：“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”吗？

那么，陈伯达之流真对我有过什么直接的迫害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起码我没有觉察。

我看到的只有一件事（像这样的事，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，陈伯达亲笔写的篇名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在